

一个毁灭文化、毁灭青年，也毁灭了未来的年代

——教育大家、军事大家、工商业大家、文化知识大家、戏剧大家、出版大家、民主大家怎样变成右派大家、反革命大家？

作者：武宜三（香港五七学社）

周光壁《路在何方？——一个书香大家庭的悲欢离合》因故不能出版了，但是一个大好的家庭被摧残得七零八落、家破人亡；一个翩翩佳公子被流放山区农村受尽折磨、九死一生；本来对国家可以有更大贡献的一代青年学子却无端被迫害、被扼杀；“革命”功臣、抗日英雄被打成反革命，被消灭；棒打鸳鸯、如花美眷被拆散……仍然让我痛心疾首！

周光壁一家，是“知识大户”、“教育世家”，转眼间变成“右派大户”、“反革命世家”——除他自己被打成右派分子外，他的父亲周大焄、大姐周光莹、两个姐夫——赵一明（民盟四川省委副秘书长，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川军将领“起义”的策划者之一）、杨宁祖也是右派分子，全家有 5 个右派分子。当过远征军、打过日本的大哥周光垣由“历史反革命”被“升格”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关押劳改十五年。其中，赵一明自杀未遂、杨宁祖受迫害致死。

像这样的“右派大户”还有：

国军上将、四川省主席王缙绪一家。

王缙绪将军是“起义”将领，1957 年看到许多老朋友被打成右派分子，就申请去香港、想离开中国大陆，结果中途被拘捕，自己被害，儿子和孙、曾孙辈也有十多人受到残酷迫害：

长子王泽浚（国军中将，曾任第 9 绥靖区副司令长官兼任 44 军军长），王泽浚追随父亲王缙绪出川抗战 8 年，父子俩率 200 多万四川子弟兵参加了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湘粤赣边区和西峡口会战等战役。父子都获称抗日名将。在淮海战役中，因头部重伤被俘，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26 年，1974 年被打死于狱中，是唯一未被特赦的高级“战俘”。

王泽浚发妻胡伯媛（1904 - 1964）也是死在监狱里。

王泽浚共有三个儿子：

——长子：原名王凤昌，改名王复加（人民出版社编审），1957 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北大荒劳改 23 年。

——二子：王凤灵（成都医科学院脑外科主任，医学专家），运动初期被整死。

——三子：王凤翔特级教授（航空院校高级教授及高级科研专家），被打成右派兼反革命分子。

王缙绪二子：王泽汉，被运动惊吓病亡。

王纘绪三子：王泽资〔王大虎，作协重庆分会创作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重庆分会常务委员兼创作研究部副部长〕1957年被打成极右分子。

王大虎妻子：曾容（重庆市话剧团演员）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王纘绪四子：王泽重（工程师）以反动学术权威，被打成右派分子。

——王泽重的儿子王凤律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王纘绪五子王泽东（王立新），1932年出生，194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22期，安排台湾东南长官公署工作，未去，改调贵州宪兵十二团任少尉队长，刚任职就被捕入狱30多年，至1981年出狱，已成60岁的老童男，因工作年限已过，无职，居成都，已故。

王纘绪七子王泽仁，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被关押数年，死在狱中。

王纘绪八子王泽嘉，在1957年被打成极右分子，已故。

王纘绪九子王泽绵，在1957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现居成都。

王纘绪十子王泽庸，是在重庆大学三年级学生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现居重庆。

一家竟出了十多个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只有第六子王泽远，16岁考入海军，在美军十三航空队工作，后随军到台，1955年以少尉军官退伍。后成为台湾著名作家（高庸），得善终。

“工商大户”的重庆康家三代，共有6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康心如、康国干、康国隼、康国杰、康宏道，再加康心之之女婿甘培根，总数达7人之多。

江南黄家，黄炎培三个儿子黄万里、黄大能、黄必信，两个女儿黄路、黄素回，一个外孙王实方，加上黄炎培本身是毛泽东御封的不戴帽的右派，他家就有6个半右派分子。

上海杨家，杨兆龙（国民政府最高院检察署前代理检察长、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及其长子杨任远、次子杨定亚、女儿杨黎明，女婿陆锦碧，一家5个人都是右派份子。

湖南杨树达一家也是由“知识大户”、“教育世家”变“右派、反革命大户”，儿子杨德骧、杨德豫、杨德嘉被划为右派分子；两个女婿袁久坚、周铁铮，是右派兼反革命分子；侄子杨伯峻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成员，文革中自杀身亡；大儿子杨德洪是杨树达一再写信动员其回国的，而落个“特务嫌疑，控制使用”；外甥女儿彭慧、外甥女婿穆木天，均是教授，双双成了右派分子；一个家族起码有9个人遭殃，加上旁支，则“不计其数”。杨树达本人死得早，否则也一定遭殃，其子杨德嘉慨叹：“我认为父亲去世的时间，确实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甘肃水家，是“知识大户”变“右派大户”的典型。水梓，是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指名让他“放毒”，一开口就打成右派分子。长子水天同，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次女水天长，兰州西北师范学院教师，四子水天中，甘肃省文化局美术工作室，都打成右派分子。三女水天光，因是右派女儿，不断受到歧视和打击。文革中，被批斗、殴打，死在河边，自杀还是他杀，不得而

知。三弟水枬，1957年8月留下“士可杀不可辱”的遗言离家出走，至今生死不明。这一家6人遭殃。

福建吴銓仕，是开明士绅。1929年任马来西亚闽清华侨公会第一任的理事长。本来是爱国之家、抗战之家，把两个儿子送上抗日战场，其中一个牺牲在缅甸。结果却变成右派之家、反革命之家。1949年吴銓仕写信给小儿子、国军中校飞行员吴其轺：“我希望你回来！叶落归根！国民党之所以败走台湾，完全是因为腐败透顶！当年我支持你们兄弟参加抗日战争；今天，我希望你回到大陆，跟着初升的朝阳！跟着共产党！建设我们的新中国！”就这么一个爱国华侨，儿子刚刚冒险从台湾回来，他自己就在1951年镇反运动中被枪毙了，他的10个儿女几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大儿子吴其玉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燕京大学教授，曾任司徒雷登的秘书，被打成右派分子；

大女吴贞宜是北京协和医院医生，因不堪凌辱而自杀；

二儿吴其瑞曾任南平副市长，被划为右派分子，文革中自杀了……

二女吴静宜，因为丈夫去了台湾，和四个子女一起备受歧视、迫害。

三儿吴其璇，3岁夭折。

三女吴端宜，与丈夫张天福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福建崇安农村监督劳动改造。

四儿吴其璋，牺牲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四女吴肃宜，福州卫生学校教育长，夫妇都被打成右派分子，遭残酷斗争、无情的打击，1979年去了美国，客死他乡。

五女吴其璵，福州一中老师，文革中和校长一起被关押批斗，身上两处骨头被红卫兵小将打断，至今无法正常走路。

吴其轺最小，驾驶的飞机三次被日军击落，又三次重上蓝天；听父亲的话，冒险从台湾回来，就被作为“反对军官”坐牢22年，出狱后靠蹬三轮车6年过活。

张泽石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学运、农运以及参与国共战争。入朝参战，因部队陷入重围负伤被俘；在战俘营担任志愿军战俘总翻译，领导战俘坚持“反迫害”、“反背叛”爱国斗争；发动生擒美军杜德准将、震惊世界的巨济岛事件；任七千坚持回国战俘的总代表。1954年，作为最后一批的交换战俘，返回祖国；受审长达一年和被视为“变节者”，受“开除军籍、中共党籍和终生控制使用”的处分。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往农村监督劳动。大哥张泽人是中右分子，父亲张止渊、二哥张泽清、二嫂向慧君，都是右派分子。

中华书局副总编、古籍出版社副总编章锡琛（开明书店老板）和他的五弟章锡洲（中国图书公司）、次子章士敦（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第四部副主任、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员）、次媳妇王清华、侄儿章士骧（中央军委总干部部）一家5个人都被打成右派分子。

王尊一（陕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古代史讲师），在《陕西日报》发表《“三害

“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向毛主席的呼吁》，指全国人民也可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共产党员，第二等是共青团员，第三等是民主党派，第四等是群众；而被划为右派分子。儿子王怀祖（财政部税务总局干部）、王忆祖（常流，福建省龙岩中级人民法院干部），妻弟常树清（河南省平顶山中学教员）等，都被打成右派分子。

川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鲜英是“民主大户”，从1938年开始就同中共打得火热，他那座叫“特园”的公馆简直就是土匪窝，民主同盟成立大会就是在这里开的；最后还把特园捐给共产党。就这样，中共还是把鲜英，他的子女鲜继坚、鲜继平，3个人一起打成右派分子。鲜家由“民主之家”变成“右派之家”、“党与共和国的敌人”之家。

费孝通先生1956年写《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说出知识分子的心里话，引起各界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并得到周恩来充分肯定，结果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哥哥费振东，费振东的女儿费曦、女婿许灿都被打成右派分子，一家4个右派分子。费孝通兄弟从外国回来、许灿是华侨青年，这个爱国大家却在1957年变成右派大家。报效祖国的初心受到粗暴地践踏、无情的嘲弄。

刘毓琪从国外到了香港，由于种种顾虑不敢回大陆；儿子刘乃中（北京电影制片厂福利科长）受中共派遣特地到香港对父亲说明共产党的宽大和英明，打消了他的顾虑，一起回到北京，以为安享退休的清福。1957年，刘乃中在极小的范围（4个人），以谈心的方式提一点意见。首先表明自己不赞成搞运动，很多运动尤其是初级阶段，总是唯物不足唯心有余。另外，“对某些没有文化知识的老革命的瞎指挥也十分不满，不少老革命只是由于资格老、打仗勇敢而当上领导干部，然而不学无术。为了体现对老革命的尊重，我主张建立‘年资津贴’，而避免在其位不谋其政。”结果被打成右派分子，大哥乃隆（地质部地质出版社副总编辑）、弟弟乃元（新华通讯社翻译部英文组翻译）也是右派分子。与丁玲、吴祖光等被发配到北大荒。真是晴天霹雳，一天父亲坐在书桌前，面对着墙上的毛泽东像喊：“毛主席！你知道吗？我的儿子都是爱国的。他们冤枉啊！”又说要到天安门去喊。是年，父因心脏病猝死，医生事后诊断为心脏栓塞。

吴祖光不但本人是文艺界大右派，妻子新风霞拒绝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与丈夫划清界限、离婚”的要求，也被打成右派分子；他的妹妹吴萸、妹夫孔繁庸（孔凡庸，谢富治的秘书）被株连也划为右派分子。同时吴祖光小家族、二流堂还是庞大的右派集团。

京剧世家叶家4个兄弟，三哥叶盛章被打成中右分子，四哥叶盛兰、老五叶盛长被打成右派分子，古来有“一个得道，鸡犬升天”，而今“一人加冕，兄弟难逃”。好端端的一个梨园世家，竟成了反动的右派窝子。

音乐家汪立三，和他两个哥哥汪岗（《四川工人日报》总编辑室主任、参加过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日远征军）、汪士诚（中共四川省成都市委工业部干部）三兄弟都是右派分子。

哥哥胡富棋（正棋，四川省珙县城关小学校长）、老二胡正云（珙县粮食局

经理股长、共青团员)、弟弟胡正华(珙县孝儿区公所会计)一起被打成右派分子。据县志记载全县 94 名右派分子,中右未计。

汪积功(1921--2017),浙江省建德县严州中学校长、浙江省建德县政协副主席;妻子王定(浙江省严州中学数学教师)、妻子弟弟王林都是右派分子。连战是汪积功外甥女婿。

定居加拿大的女作家石贝,她父亲三连襟,她舅父三兄弟,6 个人都是右派分子:欧阳静戈即石贝尊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来的医学专家,民航局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两个姨丈,一嵇(ji)成武是福建农学院教授,一杨烈是上海复旦大学研究莎士比亚诗剧的翻译家。三个舅父:梁其田,美资电影院的经理人;梁其昌,水产部高级工程师;梁其琛,医学博士,上海第二医学院外科主任、教研室主任,二级教授。这可都是社会精英呀。

孙勇烈 1935 年出生,安徽人,1956 毕业于北京解放军测绘勘测学院,基督徒世家。1957 年在成都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被打成极右分子,被送达县、南充等地劳改。当医生的爷爷和父亲同时被打成右派分子,一家三代右派!1977 年第二次判反革命罪 9 年,1980 年“平反”。现居四川德阳,全身是病,妻子在文革中被活活折磨死。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白小松是云南护国起义元勋、云南大学教授,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他两个儿子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卢汉为投共而成立的“军政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各界迎接解放军入滇筹备委员会”,白小松和儿子白祖诗都是委员;刚带领四野四兵团进入昆明的陈赓、宋任穷就在中共地下云南省委书记郑伯克陪同下到白家拜会白小松。到 1957 年,两个儿子和一个弟弟(昆明文史馆白之藩)被打成右派分子。

刘抚万,是重庆干部,人很老实,从不在大会上发言,但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为父亲在杨森手下当过县长;妹妹刘曼若、妹夫张慧光(重庆人民出版社编辑)都被打成右派分子。(谭松:《长寿湖:1957 年重庆长寿湖右派采访录》Trafford Publishing 2011)

程应镠(笔名“流金”,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妻子李宗藻(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弟程应铨(清华大学土建系讲师)、内兄李宗恩(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津(油画家、《飞夺泸定桥》作者)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西南农学院无机化学三级教授易廷鉴因考虑自己年事已高,婉拒加入共产党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大女儿易家菊(华西大学毕业,北京四十一中学教师)、小儿子易家详(清华大学毕业,北京市公安局干部)也被打成右派分子。(张海惠《我有两个爸爸》2018 年 6 月 24 日《新三届》)

上海交通大学机电系电机与电器专业毕业班学生吴美潮和他的一个姐夫张雨林(《新湖南报》编委兼《湖南农民报》副总编辑,中共党员)、妻兄周思益(北京理工大学学生),三个人都是右派分子。

高尔泰先生除他自己是右派分子,他父亲高竹园、姐姐高淑莲也是右派分子。

王桂浑(山东省青岛市文化局局长、青岛市人民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共委员、民革山东省副主任委员，青岛市政协副主席)与妻子罗江云(青岛市第二中学语文组组长)、岳父罗赤霞(青岛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革党员)，伯父王守政(青岛市居民、黄河河务局前主任工程师)都是右派分子。

其他父子(许凌青/许还山)、母子同榜(张若茗/杨在道)，兄弟、夫妻联袂，师生、师徒同科的，不计其数。丁抒先生在《阴谋》中也举了不少例子。楼乾贵，中央歌剧院演员，右派分子；他哥哥楼乾富，天津市人民银行，右派分子；他的弟弟楼乾裕，1965年“投奔祖国”，从台湾回来，马上就变成反革命，抓去劳改。楼乾裕先生后来移居香港，常常参加五七学社的活动，2010年前归主，思之不胜唏嘘。

周光壁所在的四年级80多名同学中，被划为右派分子者就多达14人。魏力仁、刘文辅二人系极右分子，“犯罪情节极其严重，态度恶劣”，被开除学籍，处劳动教养处分；张士清、朱元祯二人“罪行情节严重，认罪态度不好”，给予保留学籍，下放农村劳动察看处分；周光壁、张炳泉、傅维潼、刘宇、王石生、王文彬等7人受保留学籍，留校查看处分；卢尔德思罪行情节较轻，态度较好，免于行政处分。张乐仁、张兴仁，因有一门学科成绩不及格，受勒令退学处分而离校。

最初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受到莫斯科和苏联特务的操纵，但是，那到底是由一批有知识，有抱负——要改变落后中国的热血青年组成的。

自被毛泽东所劫持——一群土匪、兵痞、流氓、二流子(参见《毛泽东选集》、《陈独秀文集》)代替了教授、大学生以后，中共就成了反文化、反秩序、反知识、反民族、反国家的武装卖国集团；(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2005.4)从此，知识分子就长期被愚弄、被奴役、被迫害、被杀戮。

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与知识、与知识分子为敌的反动纲领；而大开杀戒，则是他上了井冈山、抓到刀把子后，直到他去见马克思，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杀人：杀AB团、肃托、延安整风、暴力土改、镇压反革命、三五反、反胡风、肃清反革命、反右派、三面红旗(大饥荒)、四清、文革(文革中又包含了许多运动——批“三家村”、扫“四旧”、批刘邓反动路线、反“二月逆流”、“一月风暴”、“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临死还来一个“四.五天安门事件”……他一生发动的所有运动，几乎都是在对付知识分子。

而反右派运动则是最严重、影响最恶劣、为祸最深的一次灾难性事件，这个运动不仅制造了180万到310万、包括中共党政军干部在内的各阶层人士成为贱民、使知识分子从此禁口、使挂着“人民”、“共和”招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彻头彻底、彻里彻外的“党天下”、“家天下”，使国家的政治文化科学技术停滞不前、长期落后，人民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也使共产党的诚信破产，使中

共统治的合法性逐渐流失。

毛泽东的接班人邓小平，由于是反右派运动的第一号打手，双手沾满鲜血，就至死不肯为右派平反，仍然坚持毛泽东路线，把反右派运动说成“有必要”的、只是“扩大化”而已。1989年，干脆把坦克车开进北京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血洗天安门广场事件，彻底暴露了他与民为敌的反动立场。

血迹斑斑的历史和现状，证明了这个时代是一个毁灭文化、毁灭青年，毁灭教育、毁灭大学，也毁灭了未来的时代。以至于一个十几亿的“人口大国”，70年来除了有两个“政治犯”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一个“不想说话”的得文学奖、一个三无老太太得化学奖以外，科学技术方面的诺贝尔奖项，一个也没有。

“抢救记忆，保存史料”，让我们有确凿的证据告诉我们的后人：不能再搞这种既害人又害己更害国家民族的所谓政治运动了。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每一次鸦雀无声之后，都是巨大灾难。只有真正做到以民为本，才有长治久安。

民主监督、阳光政策，是保证各级官员和老百姓都可以享受免于恐惧的自由，才能保护各级官员和民族精英，不让他们变成刘少奇、赵紫阳、薄熙来、王立军、孙力军。

中共当局应该学习国民党的勇气和气魄，改弦更张，放弃马列斯毛以“斗争、杀人”为核心的绞肉机理论，加快政治改革步伐。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里成立专门委员会，彻底揭发清查批判毛泽东和他的一伙独裁专制卖国的反动路线和罪行，向包括反右派运动在内的一切运动的受害人道歉、请罪并做出合理的赔偿。

（首发《纵览中国》2012.10.10/2020.8.6 补充修改）